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诗 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I 206.6

5453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诗集

张志民 主编



A0949823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0·北京

685773

HA233/05

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

主 编 张志民

主编助理 吴家瑾 姚 欣 张 红

责任编辑 潘光武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诗 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隆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32.75印张 6插页

199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1305-0/I·938 (平) 定价: 16.50元

ISBN 7-5059-1306-9/I·939 (精) 定价: 22.00元

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周 扬

总 主 编 陈荒煤

副总主编 冯 牧 李 庚

总 编 委 陈荒煤 冯 牧 赵 寻

张 庚 孔 罗荪 王朝闻

李 庚 江晓天 许觉民

《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各分集主编

短篇小说集	葛洛	戏剧集	张庚
	刘剑青	电影集	罗艺军
中篇小说集	孔罗荪	曲艺集	罗扬
	朱寨	音乐集	周巍峙
诗集	张志民	美术集	吴作人
散文集	吴有恒		刘开渠
	黄秋耘		艾中信
杂文集	曾彦修		陈伯萍
	秦牧	摄影集	徐肖冰
报告文学集	陶白		高帆
儿童文学集	穆青	舞蹈集	游惠海
民间文学集	陈模	书法集	沙孟海
少数民族文学集	贾芝	评论集	冯牧
	晓雪	理论史料集	张炯
	李乔		

中国新文艺大系主要工作人员

编辑部成员 宋文郁 李景峰 潘光武
邢沅
出版负责人 李景峰 陈宝林
装帧设计 张慈中

出版说明

(一)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新文艺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深刻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它是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编纂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目的是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研究、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我们也期望这部总集，能帮助广大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选择精英，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从中汲取教益；并能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的新文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二) 《中国新文艺大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我国新文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概貌。

(三) 《中国新文艺大系》按历史时期分辑，由近及远地编纂出版。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八二年底，共分五辑：第一辑〔1917—1927〕；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第四辑〔1949—1966〕；第五辑〔1976—1982〕。若干年后，将续编以后的各辑。

《中国新文艺大系》每辑按文学艺术的门类和体裁分集，各辑的分集根

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所有分集均有主编撰写的导言。

(四) 这次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为第四辑，共十九集。其理论部分包括评论集和理论史料集；文学部分包括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集、杂文集、报告文学集（包括通讯、特写）、儿童文学集、民间文学集、少数民族文学集；艺术部分包括戏剧集（话剧、戏曲）、电影集、曲艺集、音乐集（声乐、器乐、歌剧）、美术集、摄影集、舞蹈集、书法集；优秀的长篇小说本辑不列分集，其目录由理论史料集收选。

本辑的编纂，仍然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各分集的主编；仍然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十七年的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衡量，同时考虑某些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代表性，强调尊重历史、反映历史，强调质量第一，作到精选、严选、拔萃与代表性相统一，全面地反映新中国十七年文艺的概貌。

香港、澳门、台湾作家的作品，因资料不全，难于精确选拔，暂不收录，俟条件具备，另行增补。作品编排一般以首次发表时间或所据版本的时间为序，少数分集分类后再按时间先后排列。个别作品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的文字改动或由编者订正讹错。

(五) 《中国新文艺大系》的编纂，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文艺界的大力支持、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到有关部门及海内外专家、读者的热情赞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并恳请惠予教正。

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五月

导言

张志民

—

按照“大系”的编辑体例，每集卷首，应有篇导言，本集自不能例外，只好入乡随俗。我这篇文字，虽也名之曰“导言”，却着实难以言“导”，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篇“过来人”的“游记”；当年，我仅是位被人“导着走”的游客，今天，仍不懂怎样导游。

这一集诗选的时间界限，是从1949年10月开国大典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锣，即大家惯称的“十七年”。自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十七年纵贯了三个年代，时间的跨度很大，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既有轰轰烈烈的凯歌，也有冷冷清清的哀叹，这上达峰巅下至谷底大起大落的种种回声，无不如实地录入历史的磁带，自然也无不反映于我们的文学作品，印证于我们的诗歌。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三十几年前，震撼世界的这声欢呼，谁也不会误认为，只是毛泽东个人的一行抒情诗，升上天安门万里晴空的五星红旗告诉人们，那是神州大地上的一声春雷，是亿万人民的同声欢呼，同声歌唱！被人瞧不起的“东亚病夫”，挺起胸膛，唱起豪迈的进行曲，这声音该是何等的惊天地、泣鬼神啊！

著名诗人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以极简洁的语言，概述了这个伟大的时刻：“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宣告成立。我们各路诗人在北京会师了。我们告别了苦难的岁月，我们走上了新的路程。新的时代需要

新的歌声。”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早为我们送过《黎明的通知》的诗人，又向我们唱起一支春天的歌：

春姑娘来了——
你们谁知道，
她是怎样来的？

我知道！
我知道！

——艾青：《春姑娘》

是的，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时刻是怎样来临，懂得这个时刻的分量！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出息的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以几代人的青春和生命所换取的那个名分，终于拿到手了！“人民”这个字眼，堂堂正正地写上了共和国的国号。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开始了！诗人们，作为时代的歌手，老一代、新一代，无不热血沸腾！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清晨，都甩干了久积于笔端的血水、泪水，饱蘸欢乐的酒浆，写起光明之歌、解放之歌、建设之歌。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此间所说的“老一代、新一代”，都远不是当今的概念。建国之初，我国新诗开路人之一的《女神》作者郭沫若，还不到“耳顺”之年，翻译《国际歌》的老诗人萧三，刚刚年过五十，冰心、臧克家、冯至、柯仲平、冯雪峰、胡风、王亚平、力扬、苏金伞……只有四十几岁；艾青、田间、何其芳、光未然、卞之琳、郭小川、公木、鲁藜、袁水拍、严辰、徐迟、邹荻帆、蔡其矫、阮章竞、方冰、戈壁舟、王希坚、吕剑、方纪、曼晴、芦荻、方殷……才初度中年；李季、闻捷、贺敬之、魏巍、袁鹰、徐放、朱子奇、绿原、屠岸、牛汉、曾卓、玛金、晏明、沙鸥、蓝曼……这许多为新中国写下第一支赞歌的诗人们，当时，都还是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

列出这样长的一张名单，并不是为了“排座次”，更与当今流行的“名单学”毫无瓜葛。我知道，诗人是不喜欢“摆椅子”的，这许多人名，是依年龄的大体分界，信手写来，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建国之初的诗坛盛

况。以上所举，虽已是一支不小的队列，但仍有许多人未能列入；仅就开列的这张单子，已不难领略到那个青春的年代、青春的阵容了！

诗，是属于时代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声音和色彩；每一个时代，都孕育了代表自己时代的诗人。

二

正如五星红旗的来之不易，迎接这面旗帜的歌者们，也无不身披着历史的风霜，经历过艰难的跋涉。他们，不论是曾经战斗在解放区，是生活在大后方、敌占区，或是海外什么地方，有的为民族的解放，长期浴血奋战，有的为民主、为进步而奔走呼号，有的负过伤，有的坐过牢。他们，不仅有过非凡的人生历程，而且已经写出了不少作品，早已是我国诗坛的领唱者。

为新中国而歌，几乎成为诗人们一个共有的题目。不论是老一代的诗歌前辈，还是早在抗战前后便名震诗坛的诗人们，都把他们的全部的爱，倾注于对新社会的礼赞：艾青除长诗《双尖山》等，还写有《南美洲旅行》等组诗；臧克家除长诗《李大钊》，还写有《有的人》等广为传诵的短歌；冯至写了《韩波砍柴》、《登大雁塔》；田间除长篇叙事诗《赶车传》，还写了《马头琴歌集》等大量短诗……

新中国诞生不久，即五十年代之初，二十五岁的石方禹首先推开了这个年代的大门，他以时代的激情，深沉的思索，写出长篇政治抒情诗《和平的最强音》：

我们是平凡的人
但我们是
不可侵犯的人
因为我们的名字
就叫
人民
我们是世界上的
绝大多数

我们的声音
是世界的
最强音
我们并不向他们
乞求和平
而是命令他们
“不许战争”

这位年轻的歌手，紧紧抓住了为战后的人民所关切的重大主题——和平，以凝练、流畅、富有强烈感染力的语言，构成这篇长诗，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掌声。

李季是十七年中极为活跃的诗人。这位生长在黄河之畔，以粗犷的西北民歌为长箫短笛的歌手，早在四十年代中期，便在新诗向民歌学习的创作实践中，取得巨大的成就；建国之后，又同他亲密的诗友闻捷一起重回西北高原，长期深入生活，从事创作。他们的生活之路和创作之路，似乎是携手并行的；然而，在作品的气质上，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在沙家店战斗的前几天，
旅部里来了一百多担架队员。
他们都是绥德分区的，
只有六个人的家，住在三边。

一样树开的一样花，
三边人穿戴不一般；
身上披的羊皮袄，
红毛线的长围巾系在腰间。

——李季：《三边人》

枣尔汗眼珠象黑瓜子，
枣尔汗脸蛋是红瓜瓢，

两根辫子长又长，
好象瓜蔓拖地上。

年轻人走过她瓜田，
都央求她摘个瓜尝尝，
瓜子吐在手心上，
带回家去种在心坎上。

——闻捷：《天山牧歌》

西北是他们共有的生活基地。浓郁的生活气息，朴素的语言，清新的民歌风味，是读者为读者所喜爱的共有之长。他们除写了大量短诗外，还各自写有长篇叙事诗：《杨高传》（李季）、《复仇的火焰》（闻捷）。

既满怀时代激情，又勇于思考人生、社会的著名诗人郭小川，以一颗天真而多情的童心，以一枝勤奋而多才的诗笔，在十七年中，写了大量的诗作，除《将军三部曲》、《一个和八个》等长篇叙事诗，还有感情激越、豪迈奔放的政治抒情诗，如：《向困难进军》、《甘蔗林——青纱帐》等都曾是脍炙人口的名作。不管那个年代曾给诗人以怎样的局限和怎样的责难，诗人都把对祖国的每一缕情丝、每一滴热血，倾注于自己的笔端。郭小川是五十年代的一位重要诗人。为纪念这位惨死于黎明之前的诗友，这里，抄录他创作后期的两行诗句，以说明诗人仍活在我们心中，诗人仍在看着世界：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
不会沙哑；
战士的眼睛，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
不会昏瞎。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

贺敬之是一位创作态度十分严谨、胸襟广阔、思想深沉的诗人，他的不少名篇，如：《放声歌唱》、《回延安》、《雷锋之歌》等在十七年的中国诗坛，

在我国广大读者中产生过重大影响。诗人的产量不多，但几乎每一篇都为读者所熟记。从那些不可多得的诗篇中，既可见作者的才华，也可见作者的功力：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贺敬之：《回延安》

让我们说：

“我爱雷锋……”

这就是说：

“我爱
真正的人生”

——贺敬之：《雷锋之歌》

这些句子，读一遍就可背下来了！作者既会熟练地运用民歌体，也善于使用自由体，或是融二者为一。诗人在诗歌形式上，多有变幻，创作题材也不拘一格。他除去气势雄伟的政治抒情诗，还写有《桂林山水歌》等感情细腻、文笔绮丽的风景诗：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的深呵，梦一样的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贺敬之：《桂林山水歌》

语言明快而诗意盎然，形式多样而不失民族特色，既适于阅读，也适于朗诵，这些诗不仅深得读者喜爱，而且形成一代诗风。

除以上诸家在建国后的诗歌创作上正处于盛产时期外，还有一批更为年轻的诗人，朝气蓬勃，以坚实的步伐，登上中国诗坛，他们的许多佳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烈赞赏。

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以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心情，表现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乔林的长篇叙事诗《白兰花》，以优美的、创新的民歌体，塑造了一位纯朴、刚毅的农村妇女形象。

李瑛的《红柳集》，公刘的《黎明的城》，邵燕祥的《到远方去》，白桦的《金沙江的怀念》，雁翼的《大巴山的早晨》……以及流沙河、周良沛、孙静轩、严阵、傅仇、陆瑛、高缨、顾工、韩笑、张永枚、梁上泉、胡昭、魏钢焰、胡征、苗得雨……一大批诗人，都写有许多为读者所熟知的优秀作品，或感情浓重，或文笔清新，或手法细腻，或热情洋溢，或萧洒自如，各有各的特色。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我们丰厚的文化遗产中，少数民族的民间诗歌，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建国之后，许多濒于失传的民间史诗，如《阿诗玛》、《嘎达梅林》、《格萨尔传》、《玛纳斯》等，都得到抢救；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新成长起来的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带着他们的“冬不拉”、“热瓦普”、“手鼓”、“芦笙”，汇入中国新诗的合奏，如：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饶阶巴桑、铁衣甫江、克里木·霍加、康朗甩、康朗英、包玉堂、汪承栋、韦其麟、晓雪、金哲、吴琪拉达等，都以他们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诗作，为十七年的诗坛增色添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大系”的分工，他们的作品，多数选入《少数民族文学集》，本集就不重收了。

三

十七年是短暂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转眼一瞬；十七年又是不短的，对一个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黄金时代。十七年是丰产的，在我国诗歌田土上，有可观的收获；十七年又是多灾的，紧锣密鼓、一场接

一场的“斗争”，一次接一次的“运动”：“反胡风”、“反右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一部长篇巨著，足够几代人去慢慢咀嚼。

我是途经十七年的旅客，开国那年二十三岁，抵达此港之前，已走过了一段创作道路，那条路与十七年的路相比，是同一个指向，只有阶段的分野，没有体系的差异。

这条文学之路的美学名称，叫作“现实主义”，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大体是这位母亲的产儿。

应该说，我们的母体是健壮的，她体态丰盈，奶水充足。这位现实主义母亲，曾养育过许许多多生命力很强的孩子，在世界文学史和我国文学史上，都不难找到例证，十七年的诗歌创作，也不例外。正是基于“创作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信条，才有大批诗人自觉地到群众中去。他们长期深入在生活的最基层，与人民同甘苦、共欢乐，心和笔都紧紧地贴近现实生活；正因为这样，十七年（特别是1957年的政治风暴之前），呈现出我国诗歌自“五四”以来的又一个繁盛时代。它不仅表现于作品数量的激增，诗人行列的扩大，更表现于艺术上的成熟。在战争年代，由于时间和条件的局限，人们对自己的作品，难以精雕细刻，而此时却有了比较充裕的条件，去作艺术上的追求；广阔的天地，任诗人的羽翼翱翔，诗的题材、样式、风格，都更为丰富了。说十七年是丰产的，并不言过其实。在这段历史中，我国诗坛，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之作。凡是忠于生活、忠于现实、反映了人民心声的好诗，都当之无愧地受到人民的欢迎，历史的认可；然而，作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又不能不认真地正视，十七年的文学之路的坎坷、崎岖。

随着历史距离的拉长，我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值得反思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每想到这些，我不禁要喊一声“阿门！”，请上帝宽恕，再不可折磨那受害的众生；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的诗人，都无须再交出自己的“检查材料”，只是有义务去思考一下，播向中国诗苑的那许多优良的种籽，为什么竟遇到了那些恶劣的天候？

新中国诞生不久，写过《罪恶的黑手》、《生命的零度》的老诗人臧克家，曾把满腔热情的诗行，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我强忍着欢喜的眼泪，
朗诵着这中国人民的“大宪章”，
它比黄金铸的字更宝贵。

——臧克家：《我们终于得到了它》

诗人把这部用鲜血换来的宪章比作“大树”，愿它“庇护着亿万人民”。我们的诗歌、文学，理当也该是受到庇护的，然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老诗人的良愿，并未完全得到历史的兑现。年纪稍长的诗人们记得：正当他们意气风发、诗兴正浓，铺开稿纸准备大抒胸臆的时候，不测的风雨便突然来临了；气候的骤变，使他们不得不放下手头的诗稿，去关心“天气预报”，等待那“不及掩耳”的沉雷……恰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风云笼罩下，十七年的诗歌创作，才会出现那许多反常景象：一方面是丰产，一方面是灾年；一方面是热火朝天，一方面是贫乏单调。正是在这段历史中，诗歌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假大空，便成为某种程度上的通病。有个性的作品是难以出世的，一场比一场大的狂风暴雨，不知折断了多少花枝，扫落了多少花蕾，难怪那些幸存的果实上，也不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伤疤。

作为“过来人”，十七年中的“七灾八难”，自己都亲临其境。对那段已去的历史该怎样评说，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作为涉足当代中国诗歌之路的旅客，我丝毫也不缺少同代人的共同记忆。

时间已经过去好久好久了，十七年既已成为历史，就让它置身于历史的原位，那时的人，只能写那时的诗。近十年来，我国诗坛又呈现出一片繁茂，硕果累累，人材济济，但历史是延续的，不论当今的诗歌创作又有了怎样的发展，怎样的突破，已去的十七年，仍不失为是今日的基石，它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既可以独立成章，又是长篇说部中的一节，其成就，其教训，该怎样开列？都有待于进一步去认识。这篇粗浅的小文，实在无力承担。

四

在接受了编选这册诗集的任务之后，我们首先感到的是，工作任务很艰

巨，自己的水平有限，着实难以胜任。为弥补我们的不足，首先发出信函，请各位诗人自选篇目，为我们提供资料，然后再根据“大系”的要求，通盘考虑，决定取舍。收入本集的，主要是短诗，因篇幅之限，有些长篇诗作，未能尽收。我们的想法是：既要突出这段时期内创作比较活跃、影响比较广泛的诗人，又要照顾整个诗坛的全貌，对已故诗人的佳作，尽量查找选收。

经过多次的讨论，反复的研究，形成目前的选本。由于资料的不足和我们的能力所限，缺点、错误，定会不少，恳请读者指正，备以后修订；尤其感到遗憾的是，港台、海外诗人的作品，因缺少资料，暂未能收选，只好有待于来日补充了。

散文诗、讽刺诗和旧体诗词，在十七年中，本来也是为数可观的，但因体例所限，本集只有割爱了。

为这本选集工作的几位同志，除我之外，还有吴家瑾、姚欣、张红，大部分工作，是他们所做；潘光武同志是本书的责任编辑，自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以上便是我们这个“小集体”的工作汇报，就借此充作“导言”吧！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